

# 抗战语境下中韩文人的相互交流与身份认同<sup>\*</sup>

---

牛林杰 李冬梅

**【内容提要】**20 世纪上半期，一大批韩国文人为了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寻求民族独立，纷纷流亡到中国。他们与中国知识分子密切交流，共同探索解救民族于危难的方法和途径，由此形成了一个中韩知识分子相互交流的历史高峰期。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共同语境下，中韩文人通过交流获得了相似乃至相同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促进了他们之间密切的人际交流，同时，密切的交流又进一步深化了他们的共同身份认同。这一时期中韩文人的交流，既体现了两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又反映了两国近现代文人全新的相互认知。

**【关键词】**东亚抗战 中韩作家 身份认同

**【作者简介】**牛林杰，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李冬梅，青岛滨海学院讲师。

中国和韩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两国长期共享东亚文化的传统，是东亚历史上人文交流最为频繁的两个国家。但是，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和近代西学的文化冲击下，中国逐渐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韩国则完全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中韩两国传统的国家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巨大

---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二十世纪东亚抗日叙事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5ZDB09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变化。在此背景下，一大批韩国知识分子为了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寻求民族独立的道路，纷纷流亡中国，并由此形成了中韩近代知识分子开展密集交流的历史高峰期。

20世纪初，中韩两国都面临着近代启蒙和自强独立的历史任务，中韩知识分子通过交流，共同探索解救民族于危难的方法和途径。此时，救亡图存成为中韩知识分子的“共同话语”；而《天演论》的传入使两国知识分子觉醒，了解到弱肉强食的进化论秩序，韩国文人金泽荣与严复、梁启超等人的交流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也开始传入东亚，并于20世纪20年代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在亡国的危机面前，无政府主义作为救亡图存的手段被中韩知识分子接受，两国知识分子以救亡志士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双重身份，展开了深入、广泛的交流。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中韩知识分子又以文人战士的身份参加抗战，并在战火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近代东亚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韩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认同、民族身份认同、国家身份认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直接影响到他们之间相互交流的性质。因此，从身份认同的视角解读中韩近现代文人之间的交流，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韩近现代文人关系的内涵。

## 一 多元的自我身份认同：金泽荣与中国文人的交往

著名社会心理学家莱亚里（Leary M. R.）指出，“身份认同是指个人或群体对其显著特征或所属群体的感知和表达”，<sup>①</sup>身份认同理论认为，“人们在与他人不断地交往中获得身份/角色并依此形成自我观念，而且，在特定的情境当中，个体还会按照特定的角色来规定自己的言行；生活于复杂社会结构中的个体会因自己在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差别而形成多重的、复杂的身份，这些不同身份的排序是按照个体在与他人交往的实际行为和收益来确定的，身份的内在意义则在于扮演一定社会角色基础上形成的内在身份标准”。<sup>②</sup> 20

<sup>①</sup> Leary M. R. , Tangney J. P. , *Handbook of Self and Identity* ,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2003 , p. 74.

<sup>②</sup> 闫国疆 《问题与反思：近30年中国身份认同研究析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31页。

世纪初，较早流亡中国的韩国文人金泽荣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交流就体现了多重身份认同的性质。

金泽荣（1850~1927），字于霖，号沧江，与黄玹等并称朝鲜后期汉学四大家，1891年中进士后曾担任弘文馆纂辑所正三品通政大夫等。1905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乙巳保护条约》后，金泽荣流亡中国。在旅居中国的22年里，与张謇、余懋、严复、梁启超、吕思勉等很多中国文人进行了密切的交流。

金泽荣在离开韩国前往中国之时，曾给黄玹写信诉说他内心的想法：“时事可知，与其老作岛儿之奴，毋宁作苏浙寓民以终老。”<sup>①</sup>由此可见，在强大的日本侵略势力面前，金泽荣并没有屈服。称日本为“岛儿”，不愿意做其奴隶，说明当时金泽荣自认是优于日本人的。而“宁作苏浙寓民以终老”又说明尽管当时中国也惨遭西方列强侵略，在面对中国的时候，金泽荣仍保持了历史上韩国文人对中国的传统认知。

金泽荣来到中国之后，交流最频繁、交往时间最长的中国文人是张謇。金泽荣与张謇相识于1882年。张謇随军出征协助朝鲜平定叛乱时，通过吏部参判金允植结识了金泽荣，两人一见如故，互赠诗文。金泽荣流亡到中国后，任职于张謇创办的翰墨林书局。作为亡国者的金泽荣在中国的主要活动就是整理出版韩国的文史书籍，其所编著的大部分书籍都由翰墨林书局出版发行，而且很多书籍由张謇作序。

金泽荣在中国著书立说的目的在于保存韩国的文化。他认为“自古人国未尝不亡，而于亡之中有不尽亡者，其文献也。”<sup>②</sup>张謇在《朝鲜近代小史序》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言乎国，则謇独以为哀莫大于史亡，而国亡次之，国亡则死此一系耳，史亡不唯死不幸而绝之国。”<sup>③</sup>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期，金泽荣出于对中国的传统认知，以流亡者的身份毅然来到中国，通过整理出版韩国文献，保存韩国的历史，延续韩国的命脉。而中国文人张謇出于个人友谊和中国知识分子对韩国文人的传统认知向金泽荣提供了帮助。

① 转引自牛林杰《梁启超与韩国开化期文学》，首尔：博尔精，2002，第250页。

② （韩）金泽荣《美明堂序》，《金泽荣全集》，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8，第820页。

③ 张謇《韩国历代小史序》，《张季子九录·文录》第8卷，中华书局，1931，第1页。

考察金泽荣与严复、梁启超的交流,其身份认同表现出了多重性的特点:一方面是中韩文人之间传统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面对当代世界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在思考国家命运、人类命运的过程中,又表现出了“同伴者”的共同身份认同。

金泽荣与梁启超早在1914年就已有书信往来。应金泽荣之邀,梁启超曾为金泽荣编辑出版的《丽韩十家文抄》作序。该序反映了梁启超有关国家、国民、文学等方面的重要思想,影响很大:

夫国之存亡,非谓夫社稷、宗庙之兴废也,非谓夫正朔、服色之存替也,盖有所谓国民性者……国民性以何道而嗣续……则文学实传其薪火而管其枢机,明乎此义,然后知古人所谓文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者,殊非夸也。<sup>①</sup>

《丽韩十家文抄》选编了韩国十位文人的代表作品。在梁启超看来,文章承载着国民性,为经国不朽之业。梁启超作为近代东亚著名的知识分子,深刻地体会到了金泽荣通过刊行文集传承民族文化的良苦用心。他高度评价了金泽荣刊行的韩国文集,认为这其实是在延续韩国的国民性。作为国家的韩国虽然已经灭亡,但韩国民族尚未消亡,韩国民族仍有光复的希望。由此可以看出,金泽荣与梁启超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方面的主要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金泽荣与严复结识于1910年。据严复日记记载,金泽荣于该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严府拜访,严复以《原富》与《名学浅说》相赠。<sup>②</sup>此后,金泽荣与严复经常书信往来,互赠诗文。“太息汝纶归宿草,如今谁复序君来。……一代真才惟汝在,古来知己与神通”,<sup>③</sup>金泽荣称严复为“一代真才”,实指1897年严复通过《天演论》把主张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介绍到东亚,促使中韩知识分子开始深刻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严复亦作诗回复:“笔谈尽三纸,人意尚惜情。天演叨余论,阳明孰

① 梁启超《丽韩十家文抄序》,《饮冰室合集》卷32,中华书局,1989,第4册,第35页。

② 王栻主编《严复集·著译日记附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6,第578页。

③ (韩)金泽荣《赠严几道》,《金泽荣全集》,第612页。

敢任。”<sup>①</sup> 金泽荣汉文功底深厚，两人以笔谈的方式进行沟通，谈论的主要内容就是《天演论》。金泽荣在《赠严几道》中称严复为“知己”，严复则称与金泽荣“惜情”。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文人惺惺相惜，都不甘于国家被侵略的现实。在社会进化论话语中，他们超越了主客的身份认同，甚至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身份认同，获得了探索人类命运前途的东亚知识分子这一共同身份。

## 二 民族身份认同：中韩无政府主义者的交流

以弱肉强食、生存竞争为核心主张的社会进化论给东亚知识分子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它并未给出摆脱侵略的办法。1902年，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克鲁泡特金刊行了《互助论》，指出相互扶助也是促进人类社会进化的重要因素。“互助和互持，对于生命的维持、种的保存及将来的进化，是最重要的”，<sup>②</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知识分子对社会进化论产生了幻灭，同时开始积极接受主张相互扶助的无政府主义，并试图通过无政府主义解决民族危机问题，促进民族的进化。因此，20世纪20年代，无政府主义在东亚发展成为一股强劲的思潮。

20世纪20年代初，一批朝鲜无政府主义者来到中国，与鲁迅兄弟以及巴金等中国作家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吴相淳、李又观、李会荣等朝鲜无政府主义者经常拜访北京八道湾十一号周宅，其中，李又观是第一个出现在鲁迅日记中的韩国人——“1923年3月18日，晴，星期休息。午后寄胡适之信。下午李又观来”<sup>③</sup>——周作人日记也多次提到李又观。<sup>④</sup> 李又观原名李丁奎，是韩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他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曾在1923年提出“洋涛村建设案”，计划在湖南省汉水县（现为汉寿县）洞庭湖畔的洋涛村建设理想型农村，并促进50户韩人移居此地，与中国人共同耕作，建设新农村。<sup>⑤</sup> 这与周作人提倡的新村文化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周作人早在1906

① 王棊主编《严复集·送朝鲜通政大夫金沧江泽荣归国》第2册，中华书局，1986，第375页。

② （俄）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周佛海译，商务印书馆，1921，第3页。

③ 《鲁迅全集·日记十二》（编年版）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第613页。

④ 《周作人日记》中，大象出版社，1996，第235~248、246页。

⑤ （韩）李丁奎《又观文存》，首尔：三和印刷出版社，1974，第4页。

年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并于1919年在《新青年》发布启事，宣布成立“新村北京支部”，试图用相互扶助的和平办法改造社会，以促进中国社会的进化。

李又观与周氏兄弟的频繁交往说明，中韩知识分子在无政府主义的相互扶助论上获得共识，以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份共同进行社会改造，以摆脱列强的侵略。而中韩知识分子之所以采取“新村”等相互扶助的方式，与弱小民族的身份不无关系。弱小民族在弱肉强食的进化论秩序中，无法获得进化的机会，而弱者的联合能够促进进化的互助论，使弱小民族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可以说，此时的中韩知识分子在弱小民族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双重身份认同下，展开了积极的交流。

至于殖民地脱离“母国”的战争，弱小民族反抗强国的战争，虽然其目的与我们的理想不同，但我们并不反对。<sup>①</sup>

20世纪20年代，中国著名作家、无政府主义者巴金与柳林、柳树人、柳子明等朝鲜无政府主义者频繁交流，并于1926年在柳树人等发行的《高丽青年》创刊号上发表《一封公开信》。他支持朝鲜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后来又将朝鲜无政府主义者的事迹创作成《发的故事》。但他在1927年出版的《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中曾指出，无政府主义者不反对弱小民族反抗侵略的斗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巴金认为，弱小民族反抗侵略的斗争“与我们的理想不同”，即中韩摆脱殖民的目的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并不相同。

无政府主义主张消除国家，但朝鲜人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却以恢复国家独立为目的。1927年，柳林与柳树人等人在上海成立朝鲜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韩国（朝鲜）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而且自古就已建国，在战后的新和平时期，应当获得建立完整独立国家的权力”。<sup>②</sup> 朝鲜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署名的《朝鲜独立党等党派联合宣言》宣称其革命目的是建立独立

<sup>①</sup> 《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巴金全集》卷18，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第113页。

<sup>②</sup> 《韩国独立党等党派联合宣言》，《旦洲柳林资料集》，首尔：旦洲柳林先生纪念事业会，1991，第50页。

的国家政权。“如若不思保国，只要求保种，其国不保，其种随亡”。<sup>①</sup>在北京活动的无政府主义者申采浩认为，国家灭亡，民族亦将不保，因此同样主张恢复韩国政府的独立职能。总之，对朝鲜无政府主义者而言，重建国家是最大的目标。这与无政府主义消除国家的目标是相悖的。

同样，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也面临着这一问题——中国也处于被列强侵略的半殖民社会，寻求民族的解放与独立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周作人在中国掀起“新村”运动，目的就是通过互助的办法改造中国社会，促进民族的进化，以摆脱被殖民的命运。也就是说，对中韩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无论是“新村”运动还是《发的故事》中提到的暗杀活动，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民族解放。

可以说，对中韩知识分子而言，无政府主义只是一种手段——反抗侵略、寻求民族独立的手段，并非目的。两国知识分子以无政府主义的相互扶助论为理论基础，促进民族的解放与进化，并推动国家的重建。换言之，被侵略的历史事实使无政府主义运动融入民族解放运动之中，即东亚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成为寻求民族解放的重要手段。《发的故事》中，中国人“我”与朝鲜人“金”的头发被拧成一股后，再也无法分开。这暗示着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眼中，中韩无政府主义者具有相同的身份——既是无政府主义者，又是寻求独立的民族斗士。

### 三 抗日战士的身份认同：中韩作家笔下的抗日战士

1937年，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在华从事抗日独立运动的韩国各党派共同组建了“朝鲜民族战线联盟”，颁布了《朝鲜民族战线联盟斗争纲领》。《纲领》明确指出“在国内实行倭敌的后方搅乱和武装斗争，在东北参加抗日反满斗争，在中国关内，直接参加中国抗战。”<sup>②</sup>1940年，经中国政府批准，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总司令部，李范奭任总参谋长。此后，韩国光复军与中国抗日武装联合抗战，抵抗日本的侵略。

①（韩）申采浩《保种保国的元非二件》，《申采浩散文集》，首尔：宝库社，2010，第71页。

②《朝鲜民族战线》创刊号，1938，第16页。

对于韩国人而言，在华的抗日斗争具有双重意义。抗日既是韩国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欲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朝鲜，则仅限于朝鲜民族的独立斗争远是不够，须得抓住中国对日抗战的机会。”<sup>①</sup> 朝鲜民族战线联盟的机关刊物《朝鲜民族战线》指出，朝鲜民族的解放与中国抗战的胜利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朝鲜民族解放运动的另一种形态。换言之，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的抗战与朝鲜的民族解放已融为一体，抗日战争是两国人民为赢得民族解放而共同进行的斗争。

身份认同理论认为，“个人或群体所属的社会环境及其变迁，以及贯穿其中的政治和社会因素，都会对身份认同产生影响”。<sup>②</sup>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韩知识分子的交流内容、交流形式以及他们的身份认同都发生了变化。韩国知识分子在中韩联合抗日的大背景下，开始重新探索他们的身份建构。他们既是一名肩负着解放韩国历史重任的独立运动家，又是一名驰骋于中国战场的抗日战士。中国作家无名氏（本名卜宁）在他的作品中就详细记录了这样一位韩国抗日战士的事迹。

1943年，无名氏在《华北新闻》连载了小说《北极艳遇》，后来又以《北极风情画》为名发行了单行本，一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北极风情画》的原型是韩国光复军总参谋长李范奭，李范奭又名铁骥，1900年出生于首尔。他15岁来到中国，16岁进云南陆军讲武堂，“九一八”事变后，在马占山的抗日武装中任作战科长，1933年应韩国临时政府之召出任韩国光复军总参谋长，1948年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后，曾任国务总理兼国防部长。

李范奭与无名氏结识于1941年，无名氏在重庆采访金九，撰写了《韩国临时政府主席访问记》，并发表于香港的《立报》。不久，他又采访了韩国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也发表在《立报》上。从此，无名氏与韩国志士的交往日益增多。1941年，李青天与李范奭宴请无名氏，请无名氏到光复军司令部负责新闻工作。到光复军司令部工作后，无名氏便与李范奭朝夕相处。“一九四一年整冬，我和铁骥在重庆吴师爷巷一号小楼上‘同居’。一

① [韩] 一来 《我们怎样参加中国抗日战争》，《朝鲜民族战线》创刊号，1938，第7页。

② David O. Sears, Mingying Fu, P. J. Henry and Kerra Bui, “The Origins and Persistence of Ethnic Identity among the ‘New Immigrant’ Group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 66, No. 4, 2003, p. 420.

号是临时政府所在地。小楼只占六七坪，容二榻一桌一椅。常常的，每夜从八时到十二点，我要听他的哈姆雷特式的独白，长达四小时之久。替他长江大河的滔滔声作伴奏的，是一支支烟卷的袅袅烟篆，把小楼搅得烟昏雾黑，另外是一杯杯红茶的热气”。<sup>①</sup> 在倾听了李范爽的讲述后，无名氏以李范爽为原型，创作了《红魔》《龙窟》《幻》等作品。

在李范爽的讲述中，最打动无名氏的是波兰少女的故事。李范爽参加东北义勇军作战时，曾被迫撤退到俄罗斯境内，偶遇一位波兰籍少女，两人一见钟情并陷入热恋，但后来李范爽不得不离开少女随军出发，不久便接到了少女殉情自杀的消息。经过无名氏的创作，李范爽的亲身经历成了《北极风情画》的故事，并引起轰动。无名氏在小说中描述了李范爽离开波兰少女的心境“‘未来’是个渺茫的词，我就能知道明天、后天，却无法预测明年、后年，或十年后。我们在东北的抗战失败了。中国自己正陷入水深火热，哪有余力帮助韩国光复？整个民族前景茫茫，个人还有什么永恒的幸福未来？”<sup>②</sup> 韩国被日本侵占后，李范爽流亡到中国，后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决心组织武装部队，“为我们亡国十年的民族燃起民族独立革命的火焰”。<sup>③</sup> 随后在中国展开了长期的抗日独立运动，直至抗战胜利才回到韩国。

1940年，《中国诗坛》刊载了穆木天的诗歌《赠朝鲜战友李斗山先生》。穆木天是中国诗人，1937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编《时调》和《五月》；而李斗山则是韩国独立运动家，1926年加入丙寅义勇队，1939年创办《东方战友》，同时参与《朝鲜义勇队通讯》的编辑。

我们的家乡只隔着一道水呀  
如同现在我们只隔着一道板墙  
……  
朝鲜和东北的战友们  
是共同地演出了很多的奇迹

①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无名氏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9，第373页。

② 无名氏《北极风情画》，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第72页。

③ 昆明市社会科学院编《李范爽将军回忆录》，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第93页。

在白雪上洒着无数的战友的鲜血<sup>①</sup>

在《赠朝鲜战友李斗山先生》中，穆木天描绘出一幅中韩抗日战士共同浴血奋斗的场景。中韩战士不仅共同生活，更“以一种铁的誓言/在同一战线上艰苦地战斗”。<sup>②</sup> 在共同的敌人面前，中国人与韩国人并肩作战，共洒热血。战场上交融在一起的鲜血象征着中韩两国人民的紧密联合。李斗山指出“大家都以中国抗战为中心，策动各民族之人力和物力，联合一致，铲除扰乱和平秩序公敌的趋向。”<sup>③</sup> 李斗山的主张与穆木天的诗歌传达出同样的意志——中韩两国人民联合斗争，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境。在共同抵御日本侵略的过程中，中韩文人被历史赋予了一个新的共同身份——抗日战士。

勇敢的战士们！扬子江的流水正象征着你，  
你们的血——浪涛，你们的呐喊——咆哮，你们的意志——洪流；  
为了人类正义世界和平，非把一切危害人类的野兽消除。<sup>④</sup>

1939年，《朝鲜义勇队通讯》刊发了韩国国民党党员金维的抗日诗歌《扬子江：敬赠中国的战士们》，歌颂中国抗日战士的英勇斗争。金维将日本视为豺狼，“虎豹豺狼踏在你身上，吸吮着你的血，吞噬着你的肝脏”，批判日本的侵华行径。同时，他将中国战士视为扬子江的滔滔流水，咆哮着“向着那万恶的野兽猛扑”。他认为中国人民消除危害人类的“野兽”，既解放了自我，又维护了世界的和平，即中国的抗战在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同时，还“为求自由求解放的盟友们”而战，而朝鲜则是中国抗战的重要盟友。<sup>⑤</sup> 金维对中国的抗战表示了高度的认同，他认为中国的抗战与朝鲜民族解放运动密不可分，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一环。

无论是中国的无名氏、穆木天还是韩国的李斗山、金维，都作为抗日文

① 穆木天《赠朝鲜战友李斗山先生》，《中国诗坛（广州）》1940年第6期，第2页。

② 穆木天《赠朝鲜战友李斗山先生》，第2页。

③（韩）李斗山《七七事变与中国复兴运动》，《朝鲜义勇队通讯》1939年第16期，第5页。

④（韩）金维《扬子江：敬赠中国的战士们》，《朝鲜义勇队通讯》1939年第19~20期，第6页。

⑤（韩）金维《扬子江：敬赠中国的战士们》，第6页。

人活跃在抗战的第一线。中韩作家在抗战前线达成了高度的身份认同，他们既是文人，又是战士；而他们的抗战活动，既是中国解放战争的一环，又是朝鲜民族独立运动的基础，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四 结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韩文人经历了由封建社会转型到近代社会的时代巨变，同时又在进化论的影响下积极探索民族的前途，近代爱国志士成为他们共同的身份标识。20 世纪 20 年代，中韩文人通过不断的探索，试图运用无政府主义理论改造社会，以获取民族独立，他们以民族斗士的身份奋起反抗。随着中国抗战的全面爆发，联合抗日成为中韩文人的首要任务，抗日战士的共同身份因时而生。这一时期，中韩知识分子的身份虽然不断变化，但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使他们在每段历史中都达成了相似乃至相同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促进了他们之间密切的交流，同时，密切的交流又进一步深化了他们的共同身份认同。概而言之，近代中韩知识分子的交流，既体现了两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又反映了两国近代文人全新的相互认知。

### On Direct Communication and Common Identity of Chinese and Korean Literati in the Context of Anti-Japanese War

*Niu Linjie , Li Dongmei*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 a large number of Korean literati fled to China in order to shake of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and struggle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They have maintained close exchanges with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jointly explored ways and means to rescue the nation from disasters , thus reaching its unprecedented peak of mutu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ese and Korean intellectuals. Under the common context of resisting Japanese

fascist aggression , Chinese and Korean literati gained similar or even identical identity through communication. This identity promotes their clos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 and at the same time , close communication further deepens their common identity.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Korean literati in this period not only unveil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 but also reflects the new mutual perception between the literati of the two countries in modern times.

**Keywords** East Asian Anti-Japanese War; Chinese and Korean literati; Identity